

第一章 消费需求变动的宏观分析

从本章开始，我们用三章篇幅论证说明近代中国总需求的变动趋势及其特征。本章及以下两章试图深入到总需求内部，运用实证分析和动态分析方法，就近代中国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长期变动进行探讨。本章首先从宏观的角度，分析消费需求的变动趋势及其原因，并加以国际间比较，以求从总体上认识我国近代消费需求水平，并论证和说明近代中国消费需求不断上升的规律性特征。

第一节 消费需求的变动趋势及其特点

如前所述，近代中国消费需求是由国民个人消费需求和政府消费支出两部分组成。近代政府消费支出呈逐渐上升趋势，并对总需求变动和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但限于资料，本章则把消费需求一概视之为国民个人消费需求，不对政府消费支出另作详细考察。

关于中国近代经济发展过程中城乡国民个人消费需求的长期统计资料十分缺乏，唯一的一次横截面资料是《中国国民所得》一书中对 1933 年国民消费需求的调查统计，该书运用北平生活费指数加以引伸，估计了 1931~1936 年各年份的消费需求总量。此后，刘大中、叶孔嘉在《中国大陆经济 国民收入 and 经济发展，1933~1952》书中，也对 1933 年国民消费需求总量及其结构进行了估计。

统计数据的缺乏无疑增加了该课题的研究难度，致使迄今尚无人对消费需求长期趋势作专门而系统的研究。不过，可喜的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大量零散而又极为珍贵的家计调查资料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方便。笔者就是依据这些原始统计数据并对其加以重组和综合，推算出近代经济发展中若干年份的国民消费需求总值。请看表 1.1。

表 1.1 近代中国国民消费需求的长期变动 (1887~1952)

单位：亿元 (1933 年币值)

年份	消费需求总额	消费需求各项内容总额				
		食品	衣服	房租	燃料灯火	杂项
1887	131.94	—	—	—	—	—
1917	132.45	98.47	9.00	10.76	8.23	5.99
1922~1925	166.96	107.94	28.54	6.67	13.90	9.91
1926	216.53	136.41	16.02	17.88	21.52	24.70
1927~1928	224.96	132.89	15.66	25.93	19.20	31.28
1929	238.25	144.29	14.34	19.40	12.56	47.64
1930	218.33	127.14	15.24	20.33	15.24	40.38
1931	265.90	169.20	22.10	13.50	21.20	39.90
1932	273.90	176.80	21.00	13.60	21.40	41.10
1933	273.20	175.20	21.70	13.70	21.60	41.00
1934	252.90	157.80	21.40	13.90	21.90	37.90
1935	267.60	168.10	23.10	14.10	22.20	40.10
1936	279.80	177.40	23.70	14.30	22.40	42.00
1952	206.60	—	—	—	—	—

资料来源：1887~1936 年数字系笔者推算；1952 年见《中国统计年鉴》1984 年，第 33 页，按 2.1:1 折算成 1933 年币值。

用表 1.1 估算所得，来分析近代中国国民消费需求的变动趋势及其特征，似乎可以得出如下几个结论：

1. 中国自 19 世纪 80 年代中期近代化开始起步以后至 20 世纪 30 年代中叶，国民消费需求变动的总趋势是不断上升的。名义国民消费需求总额由 1887 年的 43.98 亿元 增加为 1936 年的 322.13 亿元，49 年间增加 6.3 倍 年均增加值为 5.67 亿元，年平均增长率为 4.1%。若以 1933 年可比价格计算，1936 年比 1887 年增加 147.76 亿元，49 年中增加 1.1 倍 年平均递增 1.5%。这充分表明，持续上升是我国近代消费需求长期变动的一个总特点。

表 1.2 近代中国国民人均消费需求的长期变动（1887~1952）

1933 年币值

年份	消费总额 (亿元)	人口数 (亿人)	人均消费额 (元)	年份	消费总额 (亿元)	人口数 (亿人)	人均消费额 (元)
1887	131.94	3.775	34.95	1931	265.90	4.747	56.01
1917	132.45	4.409	30.04	1932	273.90	4.748	57.69
1922~1925	166.96	4.450	37.52	1933	273.20	5.090	53.67
1926	216.53	4.462	48.53	1934	252.90	5.096	49.63
1927~1928	224.96	4.518	49.79	1935	267.60	5.101	52.46
1929	238.25	4.617	51.60	1936	279.80	5.107	54.79
1930	218.33	4.623	47.23	1952	206.60	5.748	35.94

资料来源：人口数，1887 年见王士达：《近代中国人口的估计》（《社会科学杂志》第 卷 1 期）；1917~1927 年系笔者推算；1931 年见国民党内政部调查统计；1932 年依据 1931 年人口数 按吴承明先生《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力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 年第 2 期）文中人口年均增长率比例折算而成；1933~1935 年依据 1936 年人口数 按吴文比例折算；1936 年数见章有义先生估算《近代中国人口和耕地的再估计》，《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 年第 1 期；1952 年见《中国统计年鉴》1984 年。

据表 1.2 可以看出,近代中国人均国民消费需求额亦呈逐步上升态势。名义人均国民消费额,1887 年仅为 11.65 元,1936 年增加到 63.07 元,年平均增长率为 3.5%。若按 1933 年可比价格计算,1936 年比 1887 年增加 57% 年均递增仅为 0.9%。可见,无论是现期价格,还是可比价格计算的人均消费需求增长速度均低于国民消费需求总额的增长速度。需要指出的是,近代中国人均国民消费需求虽呈现上升趋势,但其基本特征是低水平上升,且上升幅度较小。19 世纪 80 年代中国人均消费额为 30 元有余至 20 世纪 10 年代略降至 30 元,而到 20 年代也不过 45 元左右,到了 30 年代,1931~1936 年间人均消费额略升至 54 元。这说明旧中国国民人均消费需求呈明显的低水平波动上升。

西方工业化国家经济增长的历史表明,消费需求上升趋势是商品经济不断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客观规律性。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来看,实际工资呈上升趋势,在存在商品货币关系的情况下,需求的上升主要表现为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的上升。实际工资的提高,反映着需求的上升,反映着需求上升规律的作用。正是由于消费需求的上升,从而促进社会生产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反过来又进一步促使需求上升。

同样 中国在经济近代化过程中 消费需求不断上升的变动趋势也是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和商品经济不断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随着近代经济增长和商品化程度的加深,实际工资水平的提高和生产供给能力的增强,人们的消费需求不断得到开拓,需求不断得到满足,消费能力日趋增强,从而导致消费需求逐步上升。

2. 19 世纪 80 年代至 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国民消费需求总额和人均消费需求额的上升并非直线的运动,而是在曲折的升降波动中逐步上涨,并呈现出某种周期性波动的迹象。

这表现在自 1887 年至 1952 年的 65 年间 各阶段的消费需求的增长速度是不尽相同的。国民消费需求总额在 1887 年 ~ 1917 年的 30 年期间, 每年平均增加 17 000 万元 年均递增幅度极为有限; 反而人均国民消费需求年平均减少 0.16 元 年增长率为 -0.5% 。1917~1932 年的 15 年中 国民消费需求总额呈明显的上升趋势, 平均每年递增 9.43 亿元 年增长率将近 4.9% ; 人均消费需求年均增加 1.84 元, 年均增长 4.4% 。而 1932~1934 年期间, 国民消费需求总额年平均增加额和增长率均为负值, 分别为 -7 亿元和 -2.6% ; 人均国民消费需求亦呈现同样的趋势, 1934 年比 1932 年减少 8.06 元 平均每年少消费 2.68 元。1934~1936 年间, 国民消费需求迅速上涨, 平均每年增加额为 7.97 亿元 年均增长 3.4% ; 人均国民消费需求也表现出相同的态势, 其年均增长率达 3.3% 。1936~1952 年的 16 年期间, 名义国民消费需求平均年增加额也没有超过 1934~1936 年和 1917~1932 年时期, 为 7 亿元 年增长率仅为 1.9% 若以 1933 年币值计算 其年均增加额和增长率却为负值, 分别为 -4.6 亿元和 -1.8% 。

我们若将表 1.1 数值绘制成曲线, 可以清晰地显示出中国近代国民消费需求变动的周期性波动迹象。若以 1917 年作为周期的上升期的起点 则 1932 年上升至最高点, 从 1933 年开始下降 至 1934 年跌至谷底 其后为上升期 预示着下一周期的开始。而上一周期 1887~1917 由于缺乏连续的国民消费需求数值, 我们无法作出明确的分析。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后 中国转入战时经济状态 通货膨胀, 物价上涨, 生产供给能力大幅度下降。1936~1949 年期间, 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为 -2.85% 人均国民收入为

-3.73%。^① 国民经济遭受严重破坏，国民收入水平急剧下跌 因而 即便在没有计量分析的情况下 也不难判断 这期间实际国民消费需求将会大幅度下跌。以 1936 年可比价格计算的 1952 年人均需求值仅为 30.4 元 只相当于 20 世纪 10 年代末的水平，即明证。

3. 近代中国国民消费需求不断上升不仅表现在消费需求总量的上升，而且表现在消费需求结构的变化。随着近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商品化程度的提高，国民收入水平的不断上升，近代中国居民的消费需求层次也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

表 1.3 近代中国国民消费需求结构的长期变动（%）

年 份	食 品	杂 项	年 份	食 品	杂 项
1917	74.33	4.52	1931	63.60	15.00
1922~1925	64.65	5.94	1932	64.50	15.00
1926	62.99	11.41	1933	64.10	15.00
1927~1928	59.07	13.90	1934	62.40	14.90
1929	60.56	20.00	1935	62.80	14.90
1930	58.23	18.50	1936	63.40	15.00

资料来源 根据表 1.1 数据计算。

从经济发展史的角度来考察，国民消费需求结构的发展演变是按照一定的规律进行的。许多著名的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如恩格尔、库兹涅茨、钱纳里等人已经对此进行了大量的探讨和研究，并对消费结构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进行了分析和阐述。虽然各国居民的消费结构及其变动趋势受多种因素的制约 如产业结构、收入水平、价格水平和价格结构、人口及其构成、消费水平、消费心理和消费习惯、历史文化传统、地理环境等而表现出明显的差异，但就一般意义而言，消费结构

王玉茹：《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 年第 2 期。

的变动呈现出共性特征。如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结构的层次不断上升，居民用于生存资料的比重不断下降，衣着、房租和燃料灯火等生活必需品的消费所占比重趋于稳定或有所升降，而杂项等非生活必需品、耐用品和劳务即享受和发展资料的比重呈持续增长趋势。

测度国民消费需求结构发展趋势和判断国民生活水平高低具有多种指标，其中，在国际上普遍认可并广泛采用的分析方法是 19 世纪德国杰出的统计学家恩斯特·恩格尔(Ernst Engel) 创立的“恩格尔定律”。其主要内容是：随着收入的增加和消费总支出的增加，用于购买食物的支出的绝对额也随之增加，但食物支出在全部消费总支出中所占比重是逐渐下降的，表明这种食物支出与消费支出之间比例关系的系数叫作恩格尔系数。

表 1.3 中数字反映了我国近代国民消费需求结构的时间序列状况。表中数字显示，随着时间的推移，食物支出占总消费支出比重呈逐步下降趋势，符合恩格尔定律。1917 年国民恩格尔系数为 74.33% 迄至 1936 年降到 64.30%，19 年间下降了 10.95 个百分点，年平均递减 0.57 个百分点。同时，体现享受和发展资料的杂项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比重却是呈逐渐上涨态势，1917 年为 4.52%，1936 年上至 15.0%，19 年间上涨了 10.48 个百分点，年平均递增 0.55 个百分点 低于恩格尔系数年平均递减速度。

国民用于生存资料比重的不断下降以及用于享受和发展资料比重的不断上升不仅是国民消费需求结构不断趋于合理的反映，也是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国民生活质量提高的具体体现。联合国粮农组织曾依据恩格尔系数，将生活水平划分为如下标准 恩格尔系数在 59% 以上者为绝对贫困状态的消费；50~59%，为勉强度日状态的消费；40~50% 为小康水平

的消费 20~40% 为富裕状态的消费 20% 以下为最富裕状态的消费。以上分析表明,随着近代经济的发展,国民消费需求和层次随之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但按照联合国上述标准来衡量我国近代国民消费需求结构变动趋势,可以看出我国近代国民消费需求结构在本世纪一二十年代是处于一种由绝对贫困状态的生活水平向勉强度日状态的生活水平转变过程中。1931~1936 年间,恩格尔系数又升到 60% 以上,6 年间平均恩格尔系数为 63.5%,这说明该期间国民消费和生活水平尚未冲出一二十年代的贫困状况,更没有向小康标准迈进的迹象。

4. 国民消费需求结构的不断上升趋势,不仅反映在社会整体国民的总体状况上,而且体现在各阶层消费需求相互消长的变动情况。限于资料,我们只将 1887 年和 1933 年有关国民各阶层消费需求数字加以比较,在中国近代经济发展这最为有代表性的近 50 年中,国民社会阶层结构的消费需求变动趋势确乎给我们以下几个印象:

(1) 富有阶层的消费需求总值及其在全部消费需求中所占比重明显缩小,普通国民的消费需求总值及其所占消费需求的比重略有上升。根据张仲礼和巫宝三书中的数字加以推算,1887 年时占全国人口 2% 的富有阶层的消费需求总值为 20.07 亿元(1933 年币值,下同),^① 占全部国民消费需求总值的比例达 15.2%;而 1933 年时占全国人口 1% 的最富有阶层的消费需求总值只有 9.54 亿元,其占全部国民消费需求的

^① 本书中所用 1887 年数据均引自张仲礼著《19 世纪 80 年代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粗略估计》(刊《南开经济研究所季刊》1987 年增刊第 1 集)或以文中数字为基础推算所得,下文不再一一注明。

比例仅为 4.67%，^① 远不及 1887 年时占全国人口 2% 的最富有阶层消费需求在全部国民消费需求中所占的份额。若计算占全国人口 6.5% 的富有阶层（包括非农业区的上户和中户）的消费需求总值也只有 48.22 亿元，其所占国民消费需求比例也不过 23.5%。与之相对应，1887 年时占全国人口 98% 的普通国民的消费需求总值为 111.86 亿元，其占全部消费需求比例为 84.8%；而 1933 年时占总人口 99% 的普遍国民的消费需求总值却高达 194.77 亿元，为前者的 1.74 倍，其所占比重为 95.3%，比 1887 年所占比例略有上升。

（2）富有阶层的消费需求与普通阶层的消费需求差距显著缩小。1887 年占全国人口 2% 的富有阶层的人均年消费支出为 267.7 元，而其余 98% 的中低收入阶层的人均年消费支出仅为 30.23 元，前者为后者的 8.9 倍，消费水平的差距显而易见。到 1933 年时，高收入阶层与中低收入阶层的消费支出差距显著缩小，该年占总人口 1% 的最富有阶层人均年消费支出为 222 元略强一些，其余 99% 的中低收入阶层的人均年消费支出为 46 元略多一些，前者仅为后者的 4.8 倍。若以占总人口 6.5% 的富有者计算，其人均年消费支出则减少为 173.76 元，而占总人口 93.5% 的中低收入者人均年消费支出亦减少为 39 元，前者为后者的 4.5 倍。

（3）富有阶层人均年消费的绝对值明显下降，普遍居民的年均消费显著上升。如上所述，1887 年富有阶层人均年消费支出为 267.7 元，相当于 1933 年占总人口 1% 最富有阶层的人均消费支出 222 元的 1.2 倍；若与占总人口 6.5% 的富有阶层人均年消费支出 174 元相比较，则为 1.5 倍。1887 年

本书所用 1933 年数据均引自 巫宝三《中国国民所得 1933》上册（中华书局 1947 版）一书，或以书中数字为基础推算所得，下文不再一一注明。

普通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30.23 元,为 1933 年占全部人口 93.5% 的普通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39 元的 77%。

随着社会发展,高收入阶层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下降,而中低收入阶层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上升,从而使二者之间收入差距呈显著缩小的变动趋势,已为世界很多国家的 19 世纪 60 年代以来百余年的统计资料所证明。中国在其近代化过程中国民收入分配的变动趋势与同期世界发达国家和一些不发达国家国民收入变动状况相似。^① 消费变动是收入变动的函数。上述所言国民消费需求在富有阶层和普通居民之间分配差距的缩小正是近代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发生变化的具体体现和必然反映。

以上从时间序列角度考察了消费结构的层次差异的变动,下面就近代国民消费结构的城乡和层次差异展开横截面分析。

表 1.4 1933 年中国国民消费需求结构(%)

项目	区别	下 户	中 户	上 户	合 计
食品	城市	44.40	17.54	16.12	29.52
	农村	64.17	62.79	55.72	59.82
衣着	城市	10.50	20.27	20.92	15.93
	农村	6.27	6.35	7.34	6.80
房租	城市	11.12	11.96	9.56	11.28
	农村	2.91	2.38	4.96	3.77

刘佛丁、王玉茹:《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国民收入分配问题考略》,《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 年 4 期。

续表

项目	区别	下 户	中 户	上 户	合 计
燃料 灯火	城市	9.20	5.78	5.78	7.32
	农村	12.21	10.59	9.10	10.36
杂项	城市	24.88	44.45	47.62	35.95
	农村	14.44	17.89	22.88	19.25
合计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资料来源 巫宝三：《中国国民所得(1933)》上册 中华书局 1947 年版 第 160、170 页。

表 1.4 中上户、中户、下户的分类无疑是按收入的多寡划分的。20 世纪 30 年代我国国民消费结构的变动告诉我们，收入越高的阶层，其恩格尔系数就越低，而杂项所占比重就越高。这首先反映在城乡之间的差异上，如城市居民恩格尔系数仅为 29.52% 而农村居民却高达 59.82% 后者高出前者 30 多个百分点；杂项所占比例，城市为 35.95%，农村为 19.25% 前者高出后者近 17 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和生活程度的差别清晰可见。其次体现在阶层之间的差异上 城市上户的恩格尔系数为 16.12% 中户为 17.54% 下户为 44.4%，而杂项所占比重随着收入的提高而呈上升趋势，分别为 47.62%、44.45%、24.88%。而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 上户为 55.72%，比城市中下户尚低 11.32 个百分点 中户为 62.79%、下户为 64.17%；杂项所占比重分别为 22.88%、17.89%、14.44%。城市上户恩格尔系数比农村下户低了 47 个百分点，城市上户总收入中不足五分之一的比例用于食品支出，而农村下户却高达五分之三还多，杂项支出所占比重亦呈同样变动趋势，城市上户杂项所占比重高达 47.62%，而农村下户仅为 14.44%，二者相差 33.2 个百分

点，城市上户近一半的消费用于享受和发展性消费支出，而农村下户所占比例尚不及五分之一。

衣着品消费支出在生活费支出总额中所占比重逐渐上升，在达到一定水平后开始趋降，是衣着品消费支出的变动规律。表中数字显示，随收入增加衣着品消费所占比重亦呈上升趋势，但变动幅度较小，这说明我国国民衣着消费变动尚未达到由升趋降的临界点，广大国民衣着消费仍处于初级阶段。不过，衣着消费支出的城乡和阶层差异也是十分明显的，最富有阶层衣着支出比例高达 21%，而最贫困阶层不及 7%。随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住房支出所占比重呈上升趋势，是住房消费支出的变动规律。但表中数字显示，我国国民住房消费支出变动较为稳定，无明显上升或下降走势。但如果选择收入差别较大组别资料显示住房消费支出的变动规律是存在的。如 1931 年杭州市各业人员生活费支出中，公役及机坊工人房租所占比重为 10.9% 小学教师及商店小职员为 14.1%，商店大职员及公务员为 13.1% 商店经理及高级公务员为 16.1%。^① 这说明，随收入增加，房租所占比重随之增加。另外，上海工人的房租支出亦呈同样特征。^② 燃料灯火支出所占比重随收入水平的提高而递减，这是我国近代城乡居民该项支出的变动规律。这因为我国近代居民的燃料灯火消费构成和用途尚处于初级阶段，若其构成发生变化和应用范围不断扩大，那么该项支出所占比重将会随着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的提高而上升。

^① 《杭州市经济调查》1932 年第 621~623 页 转引赵津：《中国城市房地产业史论 1840~1949》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 第 87 页。

^② 杨西孟：《上海工人生活程度的一个研究》北平社会调查所 1930 年版，第 72~73 页。

近代中国消费需求变动趋势，我们还可以从生活费指数的变动中得到验证。生活费指数被认为是“测量生活费升降之寒暑表”，^①是“测视工人生活程度及货币购买能力的重要指标”。^②

表 1.5 1900~1936 年生活费指数变动

1926 = 100

年 份	指 数	年 份	指 数	年 份	指 数	年 份	指 数
1900	62.3	1910	69.2	1920	87.7	1930	118.8
1901	52.3	1911	76.9	1921	90.0	1931	113.8
1902	58.5	1912	78.5	1922	86.9	1932	105.2
1903	64.6	1913	76.9	1923	90.8	1933	92.5
1904	60.0	1914	71.5	1924	96.9	1934	89.7
1905	57.7	1915	75.4	1925	98.5	1935	99.0
1906	63.8	1916	73.8	1926	100.0	1936	112.8
1907	66.9	1917	78.5	1927	105.6		
1908	68.5	1918	74.6	1928	109.5		
1909	68.5	1919	67.7	1929	115.7		

资料来源：1900~1924 年 根据甘博孟天培：《二十五年来北京之物价工资及其生活程度》（《社会科学季刊》第 4 卷第 1、2 合刊）北京生活费指数表“基期折算为 1926 年；1926~1936 年 根据孔敏主编：《南开经济指数资料汇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年版 第 241 页）天津工人生活费年指数表“连接而成 前两表中断部分是参照“北京生活费指数”表变动幅度补充的。

据上表数字可以看出，生活费指数呈曲折不居的波动上升趋势。1936 年与 1900 年相比，指数上涨了 80%，36 年间年平均递增 1.6% 这与我们上述分析结果基本吻合 从而从一个侧面验证了本文的估算，同时也证明了我国近代国民经

杨西孟：《生活费指数编制法》，商务印书馆 1931 年版 序言。

转引李惠村：《南开生活费指数研究》，载《南开经济研究》1993 年第 4 期。

济发展过程中国民消费需求上升变动的存在。

第二节 影响消费需求变动的因素分析

消费需求不断上升的变动趋势不是一种个别的、偶然性的短期现象，而是一种普遍的、必然的客观规律，它反映着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内在本质联系，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在消费需求领域中的具体化。消费需求上升的趋势，业已为世界许多国家的统计资料所证明，如上所述，也存在于我国近代经济发展的过程中。

近代中国消费需求不断上升的变动趋势，受多种客观条件和因素的影响，从长期分析的角度看，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近代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是消费需求逐渐上升的基本前提条件

旧中国经济在其发展较为正常的 19 世纪 80 年代至 20 世纪 30 年代期间有缓慢的增长。如果按 1936 年不变价格计算 工农业总产值由 1887 年的 146.13 亿元 到 1936 年时增加到 306.12 亿元，^① 近 50 年的时间里增加了 1.1 倍 年平均增长率为 1.5%。国民收入由 1887 年的 143.41 亿元 增加到 1936 年的 354.6 亿元，^② 49 年间增长了 1.4 倍 年平均递增 1.86%。人均国民收入由 37.99 元增加到 69.43 元，^③ 增长了 83% 年平均递增 1.23%。其中，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 1920~1936 年期间，是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史上增长速度最快

王玉茹：《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 年第 2 期。

② ③ 1936 年币值，1887 年数字为刘佛丁估算，1936 年为叶孔嘉估算。

的时期，在国家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化的道路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仍以通常用来衡量经济发展的三项主要指标来看，工农业总产值由 1920 年的 229.97 亿元，增加到 1936 年 306.12 亿元，年平均递增 1.70%；国民收入由 202.37 亿元，增加到 257.98 亿元，年平均递增 1.53%；人均国民收入由 45.99 元增加为 51.51 元，年平均递增 0.71%，^① 三项指标均在抗战前的 1936 年达到旧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峰。近代中国经济的发展无疑决定了国民消费需求总量和结构呈逐渐上升态势。

二、中国近代化过程中，近代工矿交通事业的发展，使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朝着有利于劳动的方向转变趋势，也决定了我国近代消费需求的不断上升

众所周知，现代经济学一般都将消费看作是收入的函数，收入是影响消费力和消费需求极重要的因素。凯恩斯就曾指出：“在通常情形之下，总需求函数中之消费部分，确以总所得（以工资单位计算）为其主要变数。”^② 美国现代著名经济学家加德纳·阿克利也曾指出：“任何消费支出的分析，从而任何总需求的分析（因为消费要占到这个总数的三分之二），要是不把收入作为一个主要的决定因素，它是一点也不值得我们注意的。”^③

实际收入水平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需求的上升。

王玉茹：《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 年第 2 期。

凯恩斯著，徐毓枏译：《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 1963 年版，第 87 页。

加德纳·阿克利：《宏观经济理论》，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336 页。

而消费需求不断上升的变动不仅受国民收入总量变动影响，更受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制约。因为无论在总量一定或变化的条件下，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变动都决定着消费需求上升的速度和方向。

20 世纪 30 年代我国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状况告诉我们到了本世纪 30 年代，国民收入中工资薪金所占比重大 49.0% 而包括地租、利润和利息在内的其他所得为 51.0%。其中越是近代化程度高的国民经济部门工薪所得占该部门全部收入的比例就越高，非工薪所得所占比例就越低；与之相反越是生产方式落后的经济部门（如农业）工薪所得所占比例则越低，非工薪所得所占比例则越高。如制造业中工薪收入占 78.0% 交通运输业占 75.9% 商业占 69.1% 矿业占 57.9%。^①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由于近代生产部门的劳动生产率高于传统生产部门，从而导致近代生产部门的名义工资和实际工资的上涨幅度较传统生产部门为高。

西方国家财产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呈逐步下降趋势，19 世纪中期为 20~40%，在一个长时期内的稳定和轻度增长后，有些国家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开始，另一些国家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下降，现在只占国民收入的 20% 或 20% 以下；而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则呈相反方向变动，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比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更快。

19 世纪 80 年代中期中国近代化刚刚起步之时，可以认为全部国民收入基本来源于传统经济部门。而当时最为富有的绅士阶层的收入主要为地租、利息及其转化形式（如官僚及其它行业职务的报酬等），财产收入在国民收入中占有绝对大的份额，而以农民为主体的普通居民的收入在全部国民收入

巫宝三：《中国国民所得（1933）》上册 中华书局 1947 年版 第 14 页。

中只占相对偏低的比重。根据刘佛丁先生的估算，1887 年时占全国人口 2% 的富有阶层的收入占全部国民收入的比例高达 21% 而占总人口 98% 的普通居民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为 79% ；人均年收入前者为 396 元（1936 年币值）后者仅为 30 元 收入差距十分悬殊^①。

到了 20 世纪 30 年代 如上分析所示 富有阶层的财产收入所得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下降，而以劳动工资为主要生活来源的普通居民的收入在全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有所增加，尤其是近代化生产领域更为突出。

我国近代化的历史表明，财产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比重的下降，劳动收入比重的上升，使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朝着有利于普通阶层的方向转化，必然促进整个社会消费需求呈上升趋势。

三、人口规模及其构成的变动也客观上决定了我国近代消费需求的不断上升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 人口规模及其增长速度的变化 对我国消费需求的变动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人口总量及其结构的变动成为近代消费需求变动的又一至关重要的因素。

就人口规模及其增长率来看，与世界大多数工业化国家情况不同的是中国人口增长在进入近代社会前的 200 年间就明显加速。据估计 在 1650~1850 年的 200 年间，中国的人口规模由 125 000 000 增加为 410 000 000，200 年间人口增加 3.28 倍，年平均增长率 0.6%，^② 远远高于前资本主义时代欧洲人口的增长速度，从而使中国在近代化开始以前形成了

① 刘佛丁等著：《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

② 刘佛丁：《有关清代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几个问题》，《南开经济研究所年刊》1984 年。